

帝國、殖民與展示：以1903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

李政亮

摘要

1903年日本於大阪舉行勸業博覽會，該博覽會的展示原本包括中國、韓國、琉球與臺灣在內等人種。在中國與韓國的抗議之下，撤銷展出。不過，已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琉球與臺灣原住民仍被展出。

儘管學術人類館的展出引發許多爭議，該類型的展出卻成為日後日本帝國殖民地展示的典範。學術人類館的設計構想出自有「日本人類學之父」之稱的坪井正五郎之手，他從人類學的考古論據推出日本民族混合論，隨著日本領土的擴大，他的日本民族混合論也成為介入現實政治的論述。雖然日本民族混合論曾經遭到批判，不過，卻逐漸成為主流思潮。1912年日本首次將所屬殖民地產物進行展示的拓殖博覽會，正是坪井正五郎理論的呈現。

學術人類館的展出，對嘗試透過同化追求文明的琉球來說，無異是一個大的打擊。歷經該事件之後，在文明與同化之間，琉球往同化的方向邁進。

關鍵詞：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坪井正五郎、日本、琉球

1903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

1903年，日本於大阪舉行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對1877年便已於東京上

野公園舉行首次勸業博覽會的日本來說，這次勸業博覽會的舉辦並非難事。不過，這次的勸業博覽會與之前的博覽會卻有性質上的變化。其變化之一，是該次的博覽會加入萬國博覽會所需的基本質素——外國物品的展覽，在該次的

博覽會場當中，特別設立了參考館展示了來自十四個國家的物品（松田京子，2005: 155）。事實上，在後面將要討論的學術人類館成立的趣意書當中，也提到「文明各國的博覽會均設有人類館的展覽，作為萬國博覽會的本次展覽會若無人類館的展覽誠為遺憾」（野村浩二，2005: 137）。這顯示該次博覽會嘗試作為日本舉行萬國博覽會的基礎。其變化之二，則是日本首次以帝國之姿舉行勸業博覽會，1895年馬關條約滿清帝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在該次的博覽會當中，也特別設立臺灣館（註1）展示臺灣相關物品（松田京子，2005: 156~157）。

在這次勸業博覽會當中，引起中國、韓國乃至琉球抗議的爭論點在於學術人類館的設立。該次勸業博覽會允許民間參與設館，而學術人類館則是由律師出身轉往企業界發展的西田正俊出面籌設、被稱為「日本人類學之父」的東京帝大教授坪井正五郎（1863~1913）企劃。坪井正五郎曾於1889年至1892年由日本文部省派任英國研究博物館與圖書館相關領域三年，赴英期間，也參觀過1889年由法國巴黎所舉辦首次將「落後人種」進行展示的萬國博覽會（長谷川由希，2005: 73）。1903年坪井正五郎接受《大阪朝日新聞》訪問時，便指出外國的博覽會當中，多設有作為人類學參考的展示空間，以便讓世人了解世界各人種的生活等情形（長谷川由希，2005: 73~74）。事實上，坪井正五郎所嘗試移植的，正是1889年由法國巴黎所舉辦首次將「落後人種」進行展示的萬國博覽會（二宮一郎，2005: 113）。該次博覽會當中的學術人類館企劃，依《人類館開設趣意書》所述，原來準備展示北海道愛奴族、臺灣原住民、琉球、朝鮮、中國、印度、爪哇等七種「土人」（野村浩二，2005: 33）。不過，博覽會舉辦之

前，該趣意書被刊載於報紙上，該訊息也隨即被中國留日學生所知悉，歷經甲午戰爭失敗的中國留學生，在得知中國人將被展示之際，中日之間的複雜情感油然而生；在當時中國留學生所主辦的雜誌《浙江潮》當中，就有留學生以悲憤之情表達對學術人類館的看法，其意約為琉球與印度已是被滅之國，充其量只是日本與英國的奴隸；朝鮮雖曾是滿清帝國的舊藩屬，迄今已是日本與俄國的保護國；然而，愛奴族、爪哇與臺灣原住民是如同動物世界中最低等的人種，中國再如何國運不濟，也不應與這六種人種共同展示（呂順長，2005: 101~102）。最後，並透過在日有影響力的華僑孫淦反映，再透過滿清帝國駐神戶領事館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取消中國人的展示，日方當時表示同意（呂順長，2005: 102~104）。在滿清帝國與日方的交涉當中，也提及臺灣館的展示將傷害中國人的感情的說法，不過，這個訴求並未被接受（呂順長，2005: 102）。

雖然日方同意撤銷中國人的展出，事情看似告一段落；不過，在學術人類館正式展出之際，展覽館卻出現身著中國服裝、纏足的服務人員，在中國留學生於會場發現之後向日方反映，日方以該女為來自中國湖南的服務人員回應；不過，中國留學生則另找一湖南籍留學生向該女以湖南方言質問時，發現該女為臺灣人，是《臺灣日日新報》社長所介紹到該會場工作，經中國方面的再次抗議，最後以取消該女的雇用而結束（呂順長，2005: 106~111）。

學術人類館所引發的抗議並非僅止於中國方面。學術人類館展出之後，也有韓國民眾向日方抗議，在韓國公使的交涉下，最終也撤除韓國人的展示（金城勇，2005: 46~47）。不過，相關的風波並未終結，開展之後，琉球對於兩名

琉球女性的展出引起強烈反彈，其反彈來自兩方面，一方面，被展示的琉球女性是中介者以沖繩物產展示場職員名義聘用，未料，原來是在學術人類館形同被監禁地展示（真榮平房昭，1999: 25~26）；另一方面，琉球人認為學術人類館有意呈現野蠻落後的琉球形象，當時的《琉球新報》便以倍感受辱的強烈語氣提出抗議，其理由之一是琉球自1879年成為日本領土之後，當地的風俗或服裝等已隨日本本土改變，但是，日本本土卻仍將之視為日本國內的特殊民族；尤有甚者，則是將琉球人與北海道愛奴族與臺灣原住民一起進行展覽（野村浩二，2005: 51）。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人類館事件並非單一事件，以人類學專家介入參與企劃的坪井正五郎來說，不僅動用了其東京帝大實驗室的收藏支援學術人類館的場景佈置，更邀集其人類學研究後輩於展覽期間發表演說，例如伊能嘉矩（1867~1925）講演臺灣的人種，坪井正五郎本人則講演博覽會與人類學（金城勇，2005: 44）。在大阪勸業博覽會之後，1905年日本對俄國戰爭的勝利，新興帝國的地位更加鞏固。隨著殖民地與擴張企圖的加大，學術人類館展示殖民地或是嘗試進行版圖擴張人種的展示也不斷出現，例如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展出日本極力想要占有的朝鮮其人民的生活方式，1912年於東京所舉行的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當中，再次展出包括臺灣原住民、北海道愛奴族等人種；而將至人生終點的坪井正五郎則是該次人類學展示的顧問（吉見俊哉，1998: 214；長谷川由希，2005: 84）。除此之外，1914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所舉行的東京大正博覽會，除了設有滿洲館、朝鮮館等展示當地的物產、風景之外，南洋館則展示了東南亞人種的生活方式（真榮平房昭，1999: 33）。

學術人類館儘管風波不斷，但短短數年內，這樣的展出形式不斷地出現，這顯示坪井正五郎的想法得到當時殖民版圖不斷擴張的日本帝國內部的社會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學術人類館的發起人西田正俊在1903年首次擔任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委員之後，更是擔任了多達十四種不同類別博覽會的委員，與帝國擴張展示緊密關聯的包括1906年日俄戰爭勝利紀念博覽會審查員以及1912年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的常任評議員（二宮一郎，2005: 127）。

對既有文獻的檢視與問題的提出

在介紹了1903年大阪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之後，接下來便是從什麼角度解讀該事件。在既有文獻當中，基本上有兩種分析視角，第一個視角是將焦點放在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文明／野蠻的身分差異的展示上。第二個視角則是從殖民者的同化政策與身分差異的塑造之間進行討論。

就第一個視角來說，例如吉見俊哉在《博覽會の政治學》（1998）一書，除了從歷史面向追溯西方帝國博覽會的歷史與蒐集／分類／展示／消費的操作邏輯之外，也對日本1871年派出岩倉具視遣使團參訪西方博覽會並加以移植的過程進行分析。在他眼中，學術人類館這個移植自西方帝國的展示儀式，一方面意味著日本的帝國想像，另一方面也透過這樣的展示儀式操作殖民者／被殖民者文明／落後的身分差異。另外，真榮平房昭在「人類館事件：近代日本の民族問題と沖繩」（1999）一文當中，則延續類似的邏輯對學術人類館事件進行詳細的介紹。除此之外，在學術人類館事件百年之後，「演劇『人類館』上演實

踐會」(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不僅在2003年將學術人類館事件搬上舞臺,並將學術人類館事件的相關事件與討論集結成《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底下簡稱《人類館》)(2005)一書。該書的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學術人類館事件的歷史回顧與分析,第二部分則是搬上舞臺的學術人類館事件的相關討論,第三部分則是從學術人類館此一歧視事件討論現今的日本社會應該如何尊重多元的文化。不同於吉見俊哉與真榮平房昭從殖民者的操作策略進行分析,該書第一部分當中,長谷川由希的「アイヌ 民族と殖民地展示:1903~1913年の博覽會から 與呂順長的 大阪人類館における 中国側の對應について」文章,則從北海道愛奴族與中國的角度提出該事件對兩地的衝擊。在長谷川由希的文章當中,也提及了坪井正五郎的角色,在長谷川由希的看法當中,曾經留學西方並參訪人種展示博覽會的坪井正五郎,一方面模仿了西方帝國的展出形式,另一方面也仿效了西方人類學分類/展示的邏輯(長谷川由希,2005:73~74)。

值得注意的是,在吉見俊哉與長谷川由希的分析當中,都指出了殖民展示背後的知識基礎——當時位居主流的社會進化論。受到社會進化論影響的人類學,架構了文明/野蠻的分類,而坪井正五郎所主導的東京人類學會則在此架構之下建立了殖民地人種的相關知識並進行展示(吉見俊哉,1998:196~197;長谷川由希,2005:72)。

就第二個視角來說,《人類館》一書當中,金城勇的「學術人類館事件と沖繩」的文章當中,則側重了學術人類館事件對沖繩在身分認同上的衝擊。他以《琉球新報》的主筆太田朝敷(1865~1938)為例,指出學術人類館事件之後,儘管受到歧視發出不平之鳴,不過,接

下來他卻很快地提出加緊與日本同化的論調。在金城勇的看法當中,作為知識階層出身的太田朝敷,對於沖繩文化始終抱持一種低下文化的態度,所以在學術人類館事件的刺激之後,反而鼓吹加緊與「文明」日本同化。對於太田朝敷在學術人類館事件之後的身分認同轉向,小熊英二的《「日本人」の境界:沖繩 アイヌ 臺灣 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1998,底下簡稱《「日本人」の境界》)一書當中,則有著稍微不同的看法,在小熊英二眼中,太田朝敷身分認同的轉向有其曲折的過程。也就是,太田朝敷在學術人類館事件之前,便主張對沖繩舊社會舊風俗的改革,這個主張的背後,就是希望能建立一個讓日本尊重甚至與之平起平坐的沖繩。歷經學術人類館事件之後,加速太田朝敷追求「文明」的決心。《「日本人」の境界》的分析軸線主要放在日本的同化政策對沖繩、北海道、臺灣等地的衝擊與殖民者所遭遇到的反抗。日本同化政策實施的背後,與日本在西方列強環伺之下所採取的定位有直接關係。依照小熊英二(1998:628~634)的看法,日本帝國的特徵有三:第一,日本帝國是以歐美作為競爭對手;第二,其作為相對弱小的帝國採取占領鄰近國家的擴張策略;第三,在民族主義的塑造上選擇強調「日本」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內部國民意識的形成過程,如同石田雄(1998:47)所提醒的,儘管「日本」此一國號在七世紀開始已被使用,不過,這個名稱僅在日本列島部分區域長期被使用;步入現代的「日本」,如同霍布思邦所說的「傳統的創造」,也開始被想像與建構。

放在本文的脈絡下來看,關於學術人類館事件研究的兩種不同視角,其背後指出了相互纏繞的歷史線索。明治維新伊始,一方面是日本參訪並移植西方

制度例如博覽會的開端，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起點。如同利奇(Henrietta Lidchi, 2003: 161~162, 196~197)的「他種文化展覽中的詩學和政治學」(The Poetic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一文當中，援引傅柯知識／權力的觀點檢視西方帝國展示形式所指出的，能夠「看見」這些土著村落和他們的人口構成，這顯然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社會歷史的建構過程；在這個建構過程當中，人類學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人類學的知識提供了一套區分的標準。然而，這種人類學知識又如何介入現實的政治過程，或者說，介入日本建立現代國家過程當中對「日本」的想像？而被展示的被殖民者又如何看待這種展示？特別是在殖民者高舉「文明」大旗進行殖民統治的情況下。

在本文當中，筆者擬先分析日本對萬國博覽會的移植過程，其次，放在對「日本」想像的不同思潮當中，分析坪井正五郎所堅持的「日本民族多元論」如何從一個人類學者的見解轉化為對帝國日本構成的想像；最後，則嘗試指出同為日本殖民地的琉球如何面對學術人類館事件所帶來的衝擊。

日本對博覽會的移植

如同子安宣邦(2004: 5~6)所指出的，一八五〇年代是日本近代史的開端：

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3年的佩利渡航日本、1859年的日本港口開放、1860年的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及1863年的薩英戰爭等等，只要舉出上述年表中的事實，就會清楚1850年在東亞的意義。1850年象徵著由於歐美發達國家以軍事力量要求開埠使亞洲捲入所謂「資

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期。人們認為，發源於歐洲的資本主義這一經濟、政治體系正是在此時期作為世界性體系得以完成的。如果說，隨著這一整體的「世界」之完成，「世界史」之歷史性世界也得以成立的話，那麼，1850年便象徵著東亞日本被組合到這一「世界史」中來的時期。

一八五〇年代，面對西方力量的侵入亞洲以及向來作為日本巨大他者存在的中國在鴉片戰爭的失敗，引起日本極大的恐慌，事實上，日本也在1854年與美國簽訂和親條約，更為重要的是1858年與荷蘭、英國、法國等簽下開放港口的《安政條約》；在此內外壓力之下，日本迅速以明治維新作為日本持續生存以及回應內外壓力的方式。

自主的日本成為明治維新追求的目標，日本追求自主的過程當中，一方面透過全面西化趕超式地完成現代化的追求；另一方面，日本在抗拒西方為起點的現代化過程當中，最終卻也走向西方帝國的軌跡成為東方帝國。從明治維新到走向帝國之路，約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明治維新開啟到1873年因征韓論而起的「廟堂分裂」(註2)，這一時期明治政府在外交或是科學技術層面都在摸索學習階段；第二個時期則是從廟堂分裂到1881年國會的成立，這一階段的重點在於對政府進行批判的自由民權派的出現，最終，明治政權以召開國會作為回應；之後，在壬午事變、清法戰爭、甲申事變的過程當中，逐漸形成日本的脫亞意識，而前一階段批判政府的自由民權派甚至也和明治政權站在同一陣線(廣田昌希, 1985: 202)。這個轉變，恰好可以日本最大啟蒙者福澤諭吉(1834~1901)思想的轉變為代表。福澤諭吉於1872年開始發表《學問のすすめ》，該書不僅對日本國內的封建制度的身分秩序進行批判，也對中國長期以

來以文明／野蠻的「華夷秩序」對待東亞國家的方式提出批判；此外，最為重要的是，福澤諭吉一方面揭示了從個人到國家的自由獨立精神，另一方面，福澤諭吉也強調了文明的學習接受作為達成獨立的手段（廣田昌希，1985: 328~329；神山四郎，1981: 344~345）。在《學問のすすめ》之後，1875年的《文明論之概略》更是福澤諭吉的巔峰之作。不過，隨著日本對外局勢的變化，倡導國家自由獨立精神的福澤諭吉，一方面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有了轉變，1881年他在《時事小言》當中提出亞細亞改造論，然而，在1885年，他發表了觀點截然不同的《脫亞論》（註3）；另一方面，在這些著作當中，也越來越側重國家權力。邁向脫亞的日本，除了在1872年就併吞了「北方之門」的北海道，1878年更併吞了原本為中國與日本藩屬的琉球，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1910年更領有韓國。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一八八〇年代的政治思潮當中，社會進化論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影響。日本對於進化論的接受過程，來自於下文所將提及的E. S. 摩斯(E. S. Morse, 1838~1925)。摩斯原本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對進化論極為信仰的摩斯因為日本有著豐富的腕足類研究資源於1877年來到了日本，並任教於東京帝大（永積昭，1981: 7~8）。摩斯在東京帝大每週一次講授進化論，這促使達爾文的進化論在日本的擴散；1883年，摩斯在東京帝大授課內容也以《動物進化論》為名出版；之後，史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也隨之相繼出版（永積昭，1981: 8；上野益三，1968: 200~201）。儘管社會進化論在一八八〇年代才相繼出版，不過，對明治時代的知識精英來說，他們已經早一步知曉社會進化論，例如福澤諭吉在1877年左右便閱讀過史賓塞的作品（丸山真男，2003: 218）。社會進

化論對明治時代的知識精英的衝擊是相當大的，至少原本主張民權論、綜理東京帝大校務的加藤弘之(1836~1916)以及力倡平等自主的福澤諭吉都在一八八〇年代出現思想上的逆轉。丸山真男在分析福澤諭吉思想轉向時，指出西方帝國力量的更加強大，使得福澤諭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如果無法強大到足以對抗，所謂講求公平正義的自然法與國際法都是枉然（丸山真男，2003: 236~238）。同樣地，加藤弘之思想轉向的過程也與福澤諭吉相類似，他同樣也是意識到國際政治急劇的變化，這使得原本的自由民權者朝向優勝劣敗的國家生存邏輯，加藤弘之1882年所出版的《人權新說》正是這種想法的呈現（永積昭，1981: 9）。

依照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1992)一書的看法，萬國博覽會的運作邏輯在於對人或物的蒐集、分類到展示，而這個歷史緣起則可追溯至大航海時代西方探險家對「野蠻異國」的人乃至動植物的發現開始。另外，萬國博覽會除了作為國族力量的再現之外，更與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所形成的大眾消費社會有直接關聯，例如萬國博覽會龐大的觀眾潮，與隨著交通網絡日漸發達所形成的大眾旅行文化、報刊的普及等有直接關聯。就日本對萬國博覽會的移植來說，1871年所派出的岩倉使節團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岩倉使節團是當時日本政府為勵行文明開化政策，任命當時的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臣，率領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官員前往各地進行考察；該使節團1871年從橫濱出發先到美國再到歐洲考察，期間將近兩年（田中彰，2003: 5~7）。對日本來說，岩倉使節團所帶回的重要資產之一就是對西方萬國博覽會的觀察。在厚達五冊的岩倉使節團《特命全權大臣 米歐回覽實記》（底下稱《米歐回覽實記》）當

中，就記錄了使節團參觀維也納所舉辦的萬國博覽會的心得：

歐洲各國有大國也有小國。然而，作為國民自主的基本經濟力量來說，大國不足畏懼，小國不能輕看。在英法兩個最進步的文明國家裡，工業與商業同樣有很好的發展。不過，比利時與瑞士在博覽會所展覽的物品，卻因充滿獨創而讓大國深感驚訝。這種競爭，正是「和平當中的競爭」，對文明世界來說最重要的競爭。對此，我們不加以用心不行（久米邦武編著，2005: 4）。

在日本壓縮式的發展當中，1873年岩倉使節團回日本不久，便將《米歐回覽實記》進行整理，並於1875年開始發表；1875年，也正是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開始發表的年代，這可說是確立日本文明追尋的年代（田中彰，2003: 12）。此外，福澤諭吉在1876年開始發表的《西洋事情》當中，詳盡地介紹了西方的社會文化，其中也包括博覽會。福澤諭吉筆下的博覽會，不僅是各國技術的呈現，也是每一個國家風俗與人民智力優劣的再現（富田正文編著，1989: 127~128）。

1877年日本便於東京上野公園舉行第一屆的勸業博覽會，日本對於博覽會舉行的重視，如同時任內務卿的大久保利通所說的：「博覽會的功能在於提振農工的技藝、智識的開化以及貿易的增進，這些都有助於國家的富強。」（佐佐木克，1992: 29）事實上，在勸業博覽會舉行之前，日本便在1871年於京都與名古屋舉行過地方博覽會。首次的勸業博覽會從1877年的8月21日開始到11月30日為止共計102天，進場人數為45萬4000人，規模可說是聲勢浩大（佐佐木克，1992: 27）。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勸業博覽會舉行之初，手工藝製品與美術工藝占了多數，機械類的發明也逐漸出現；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臥雲辰致所發

明的「ガラ紡織機」，該紡織機是以機器運轉時發出的嘎啦聲命名（佐佐木克，1992: 32~33）。事實上，紡織業是明治時代以來日本最大的出口工業，這與明治以來封建制度的崩壞，人們必須自我謀求生路有直接關係（守屋典郎，1993: 20）。ガラ紡織機的發明，使得臥雲辰致成為富翁，隨著勸業博覽會的舉行加上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對發明保護的法律制度，日本國內確實也開展一波技術發明的熱潮（佐佐木克，1992: 33）。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西方萬國博覽會所舉辦的經驗所指出的，博覽會的舉行，並不僅是技術的再現，更是大眾消費的產物。就日本而言，日本勸業博覽會舉行的年代，也正是日本史上所稱的產業革命的年代；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為了軍隊與警察的迅速集結，首重軍事為基礎的重工業，這些重工業基礎包括鐵道。在鐵道出現之後，旅行也成為可能，溫泉旅行從一八七〇年代開始便逐漸興起，隨著鐵道網路的完備，也成為大眾娛樂的一環（南博與社會心理研究所，1990: 301~303；尾崎秀樹，1993: 134）。在交通網絡便捷的情形之下，1881年所舉辦的第二屆勸業博覽會，進場人數達到8萬2千2百人；1890年的第三屆勸業博覽會達到10萬2千4百人；1895年第四屆勸業博覽會更高達11萬3千7百人（吉見俊哉，1998: 127）。

不過，日本積極效法的西方萬國博覽會，卻也在此時出現新的展示形式。1889年，法國慶祝大革命一百週年所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當中，出現了萬國博覽會場當中首次的「土人展示村」。法國的政治脈絡在於1870年普法戰爭失利痛失亞爾薩斯之後，開始標舉「殖民民族主義」，弔詭的是，這項政策的倡導者正是自稱法國大革命理想繼承者的共和派；法國的殖民政策同時也標舉「文明化的使命」，也就是要將法國「高貴」的文化

向「落後野蠻」的被殖民者進行同化，當時法國人甚至也指出，英國人只是將會計事務所設在殖民地，法國則是將法國精神留在殖民地（竹○尚一郎，2001: 67~69）。除此之外，人類學知識機制的建立，也在此一時期逐漸完備，1870年之後，《人類學雜誌》創刊，1872年巴黎人類學學校設立（竹○尚一郎，2001: 78）。另外，法國人類學的發展在一八八○年代也出現「典範移轉」，在此之前，人類起源複數說主宰法國人類學思潮，在此思潮之下，意味著人種能力的差別是由遺傳所決定；一八八○年代，以社會進化論為基礎的單數起源說，則認為人種能力的差別因環境影響所產生，而這也提供認識「他者」的另一種途徑（竹○尚一郎，2001: 81；小熊英二，1998: 58~59）。

日本民族多元論：從人類學考察到現實政治論述的介入

關於坪井正五郎思想脈絡的討論，必須放在當時對「日本」不同的建構與論辯當中觀察；因為坪井正五郎除了人類學家的身分之外，也積極加入對日本的建構與論辯，坪井正五郎對日本人種所考察而得出的「混合民族論」不僅是其所堅持的人類學主張，日後更轉化為其對現實日本社會構成的理論。

日本人類學學術機制的逐步建立是在一八八○年代，在此之前，對日本人類學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力量來自於東京帝大所聘僱的摩斯；他對日本人類學的影響一方面是協助日本本土人類學研究者的形成，另一方面，則是嘗試對日本人的源起提出解釋。摩斯對日本人類學的重要影響在於根據對大森貝塚的考察，他指出，日本人的源起在於南方而來的民族征服原住民之後形成的；另

外，他也進而推出日本民族混合論（小熊英二，1995: 20~22）。除此之外，他對日本人類學以及人類學以外的學術影響，則在於前述所說的達爾文進化論的講授與出版。

日本第一代的人類學者成型於1884年的東京帝大理學部，十名對人類學感興趣的學生與職員在東京帝大借了一間教室開研究會，這就是日本人類學會的前身，也就是日本文獻所說的「人類學上的會合」；1886年將之改名為「人類學研究會」，並發行機關雜誌《人類學會報告》，隔年則改為《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小熊英二，1995: 24；石川榮吉等，1987: 555）。在日本本土第一代人類學研究者當中，仍為日本民族的形成爭論不已，坪井正五郎與小金井良精之間的激烈爭論便極為著名。坪井正五郎認為愛奴傳說當中的矮人為日本人的起源，小金井良精(1859~1944)則力主愛奴說（直木孝次郎，1973: 373~375；石川榮吉等，1987: 494）。雖然關於日本人源起的爭論，這些人類學者各依考據各有立場，不過，這些立場仍延續摩斯所提的日本混合民族論的大架構。

放在當時日本的脈絡下來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雖然快速汲取西方的思想、制度乃至科學，不過，從明治維新到中日甲午戰爭期間，面對強大西方壓力嘗試追尋獨立地位的日本，對日本民族混合論仍有質疑的聲音。質疑的聲音一方面來自於混合論的構築來自西方人類學家的研究，而且其論證基礎當中甚至也指出日本祖先曾有人吃人的紀錄（事實上，這是摩斯的錯誤推論），這被日本人視為奇恥大辱；另一方面，面對西方強大壓力，質疑者則從日本民族一元說作為團結日本的理論基礎。所謂日本民族一元說，就是把日本的形成回歸到日本天皇神話，也就是天皇在太古時便已出現，而日本則是在天皇的組織下

所形成（小熊英二，1995: 29, 31）。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坪井正五郎的民族混合論承襲歐美學者的看法，不過，與民族一元論者相同的是，其背後同樣嘗試建立一個關於自主日本的論述。民族一元論者有鑑於西方種種都優於日本，日本唯有採取一元論作為社會團結的基礎以對抗西方；對坪井正五郎來說，他則嘗試快速吸收西方思想，儘快建立一個屬於日本的文明。也因此，他刻意忽略歐美人類學者對日本人類學的影響（小熊英二，1995: 29~30）。1889年到1892年坪井正五郎由日本政府派至英國留學，師從有「文化人類學之父」之稱的泰勒(Edward Burnett Taylor, 1832~1917)，而坪井正五郎則是致力於圖書館與博物館的研究。受到進化論影響的泰勒，對文化有個著名的定義：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以及社會成員所能獲致的所有能力的複合體（石川榮吉等，1987: 445）。坪井正五郎留學期間，也曾赴法國參觀巴黎萬國博覽會。作為日本本土人類學奠基第一代的坪井正五郎，在返回日本之後，除了擔任東京帝大的教職之外，更將泰勒所提出的廣義人類學帶回日本並將之建制化（石川榮吉等，1987: 555）。在日本人類學第一代學者出現並逐漸建制化之後，日本人類學界也開始蒐集大量的人類學資料，其中，年輕的研究者鳥居龍藏(1870~1953)足跡便遍布臺灣、滿洲、千島、蒙古、朝鮮與中國等地（小熊英二，1995: 74）。

一八八〇年代日本的思想界有著兩股不同的力量，一股力量是全面西化的力量，1883年「鹿鳴館」的出現正是這股力量的重要標誌。另一股力量則是被稱為「國粹主義」或「國粹派」的力量。不過，此時的國粹與日後的國粹意義有所不同，此時的國粹並不反對吸收西方文化，他們強調的是國民的自覺性

與民族的獨特性；此外，他們也強調自下而上的富國強兵目標（松本三之介，2005: 112~117）。明治二十年代，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正式為國家前途摸索的時代，也是國家與個人開始分裂的時代（李永熾，1998: 311）。如前所述，一八八〇年代是社會進化論在日本高揚的年代，日本對於進化論的接受固然有其實處國際政治當中掙扎的現實脈絡，不過，更為重要的是，對於進化論的接受消解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傳統／西洋文明的二元對立，原來的兩種看法都不約而同地朝向日本國家發展方向思考（上野益三，1968: 208~209）。

在坪井正五郎回到日本之後，正逢國體論的高峰，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確立了天皇制國家；儘管該憲法當中載有信仰自由的條文，不過，1891年所頒布的《教育敕語》當中，除了將對神格化的天皇的尊敬作為教育與道德的基本準則之外，其中也強烈地加入了儒家的忠君愛國倫理思想，而這也引起了作為基督教徒的高中教師內村鑑三(1861~1930)拒絕向附有天皇簽名的《教育敕語》敬禮的「不敬事件」（石田圭三，1990: 280~282）。國體論的論述主要在於打破封建體制走向西方的富國強兵的形式，其代表人物有加藤弘之、穗積八束(1860~1912)等則多有西方留學經驗（小熊英二，1995: 50）。就國體論者來說，他們的日本想像是透過天皇為國家頂端架構一個團結而獨特的日本對抗西方。以年輕時便赴德國學習法律的穗積八束為例，1888年日本在法國法學家的建議之下，嘗試將現代歐洲較為先進的法國民法作為日本民法典修改的範本，不過，卻引起穗積八束的反對。其反對理由之一，是歐洲民法典是以個人為單位，但是日本長久以來是以家為單位，若採取歐洲民法典將危及國家的基礎（石田一良，1963: 258）。此外，在

《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之後，穗積八束進一步指出「家」與「國」之間的關聯，他認為天皇的祖先是國民的始祖，天皇是日本大家庭的大家長，而日本則是純粹血統所組成的國家（小熊英二，1995: 54）。除此之外，國體論者也對基督教提出批判，國體論者從基督教在東南亞的宣教指出，歐美力量的侵入，在此批判背後所隱藏的，則是1895年日本戰勝滿清帝國之後，嘗試爭取其在遼東半島的利益，不過卻因歐美諸國的反對宣告失敗；然而，這卻再一次激起日本對西方的敵意（小熊英二，1995: 56~57）。

值得注意的是，1895年日本對滿清帝國的戰爭獲勝之後，對日本的想像與建構更趨以國家主義導向。1897年《日本主義》雜誌的誕生就是一個指標，而當時極受歡迎的評論家高山樗牛(1871~1902)對日本主義的詮釋，則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高山樗牛對日本主義的定義是：以國民性的自主獨立精神發揮建國之初所持的道德原理；日本主義排斥所有宗教，因為宗教反國民性、反建國精神，而且阻礙國家發展（南博，2004: 40）。而在國家組織原理方面，高山樗牛則強化「君臣關係」說，他認為日本最大特質在於皇祖建國的精神、忠孝合一的國體以及進取有為的民情（李永熾，1998: 314）。值得注意的是，坪井正五郎也在《日本主義》創刊號當中發表相當不同的看法，在「短身黃果して恥づ可きか」為題的談話當中，他力主身高、膚色等與智力優劣並無必然關係，重要的是自信心（小熊英二，1995: 58）。

不過，有趣的是，無論國體論或是日本主義，他們如何面對被併吞的北海道、琉球以及新占有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就北海道來說，在日本占有之後並未有太多的關注，坪井正五郎與基督教在一八九〇年代左右便不同程度地

介入北海道的愛奴族。就時序而論，坪井正五郎為考察愛奴族的生活習慣於1888年以東京人類學會會長的身分來到北海道。在十九世紀人類學當中，人類一元論與多元論的不同看法，前者認為人類的差異因為環境所造成，而後者則是認為人類的差異因遺傳等所產生；坪井正五郎站在一元論的立場，在他考察了愛奴族的情形之後，也對愛奴族環境的困苦感到憂心，他也對愛奴族的教育運動積極參與（小熊英二，1995: 58~59）。除此之外，歐美基督教傳教士也在此時到北海道，他們一方面以愛奴族的語言宣教，一方面也對愛奴族宣傳基督教徒的基本道德信念，例如對愛奴族的一夫多妻制進行價值觀的勸導（小熊英二，1995: 60）。1897年《日本主義》發刊之後，同年，基督教也創辦《六合》雜誌。針對國體論與國粹論者君民同祖一說以及日本帝國已占有琉球與臺灣的現實情況，基督教認為如果仍以君民同族的框架來看待將顯得狹隘（小熊英二，1995: 57~58）。高山樗牛對於基督教所彰顯的平等精神，則以古羅馬帝國的衰亡與英國的強盛作對比，指出古羅馬帝國正因平等對待人類，沒有建立內外主從的差別而導致衰亡；相反地，英國將其殖民地屬民視為英王之臣民所以能夠強盛（李永熾，1998: 318）。

1895年日本於中日戰爭當中的獲勝，對日本歷史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戰勝長久以來作為巨大他者存在的中國，對日本來說，一方面是明治維新變革的自我肯定，另一方面，也開展日本往帝國之路前進的步伐。可以想見當時日本國內國家至上者情緒的高昂。在此氣氛之下，加藤弘之對坪井正五郎的混合民族論提出批判，加藤弘之在分析中日戰爭當中為何日本得以戰勝的評論當中，指出滿清帝國因為是多民族國家所以導致團結不易而戰敗，相反地，日

本是單一民族國家較容易凝聚愛國心所以戰勝（小熊英二，1995：75~76）。除此之外，加藤弘之則認為，根據坪井正五郎的學說，日本人包括日本內地人、琉球人、愛奴人、樺太愛奴人、北千島愛奴人等五個民族；但是因為後四種民族人口數量極少，因此可以忽略而不被稱為真正的日本人民（小熊英二，1995：76）。另外，古代的日本人也在研究人類學、人種學的時候，認為日本人並不是單一民族，但是，如果在歷史上把日本人假定為單一民族，也沒有什麼妨礙（小熊英二，1995：76）。

加藤弘之對坪井正五郎進行批判之際，坪井正在為改善北海道愛奴族的生活環境而奔走。赴英國留學之前便來到北海道進行人類學考察的坪井正五郎，在1899年北海道原住民保護法頒布之後，也為北海道愛奴族的教育事業奔走。而此時，兩個與日本息息相關的政治現實支撐坪井正五郎的日本混合民族論述。其一是1902年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所簽訂的《英日同盟》，對坪井來說，由多民族所構成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無疑是一個最好說明單一民族論與國家力量強大與否無必然關聯的例證（小熊英二，1995：77~78）。1903年大阪勸業博覽會開始前約半年，坪井正五郎(1903：32~36)所發表的演講 作為人類學研究所的我國 當中，就以日本與英國相提並論，並透過英國的例子闡釋多民族國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最終提到對於日本多民族的認識有助於日本國家的便利。其二則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當中，日本軍隊從北海道動員了愛奴族的力量，熟悉寒冷天氣的愛奴族士兵也在日俄戰爭當中立下汗馬功勞；而這個事例更為坪井所提出的日本混合民族論提出一個有利的論據，由多民族所構成的帝國日本，正因各民族所具有的不同能力與特性，更能夠提高日本在世

界「進出」的能力（小熊英二，1995：84~85）。在日俄戰爭之後，坪井正五郎(1905：443)更以肯定的語氣指出，人種單純對國力有益、複雜則不利的看法實為謬見。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坪井正五郎從人類學考察所得來的日本混合民族論，至此已成為一個關於日本社會構造與國家發展的論述。從坪井關於日本混合民族論的實踐脈絡來看，儘管坪井的論述基礎不同於以血緣、歷史為基礎所架構的單一民族論，不過，坪井的論述最終仍扣合到日本帝國擴張之際所需的功能層面上。而坪井在北海道對愛奴族教育事業的奔走，與宣揚「文明」的基督教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基督教在北海道宣揚「普遍」的「文明」之道，而坪井的企圖雖然同樣也在提昇愛奴族的「文明」，不過，「文明」提昇的目標最終則是以日本帝國為依歸。

不過，坪井正五郎的論述卻與高山樗牛以及加藤弘之有很大的不同。高山樗牛以及加藤弘之的著眼點，是建立一個以日本內地多數人所構成的日本成為一個足以對抗西方帝國的強國，被殖民者並非著眼的重點。這樣的思考，與日本強烈收受社會進化論的現實脈絡有其相吻之處。相反地，坪井正五郎看到或想像了另一個日本 包含殖民地在內的日本。這並不是說坪井正五郎關注到弱勢群體及其在被殖民處境當中的平等問題。他看到的是一個被殖民者如果透過「文明」加以啟發，可以更增強日本國力這樣的問題。在他的民族論述當中，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而是被期待為可以增強殖民母國國力的。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大，他的想法逐漸被接受，混合民族論逐漸成為一個有力的聲音。一九一〇年代日本博覽會的展示型態也增加一項專門展示殖民地物產的「拓殖博覽會」；首次的拓殖博

覽會1912年於東京上野公園舉行。事實上，這個博覽會的舉行，可說是坪井正五郎日本多民族論得到肯定，一方面，在博覽會開始之前，坪井正五郎已在向天皇的演講場合當中力陳多民族國家的想法；另一方面，該次博覽會各展館更是依照坪井正五郎長年所倡的包括臺灣、滿洲、朝鮮、北海道等多民族架構設計（山路勝彥，2004: 30）。

在文明與同化之間

如果說1903年學術人類館的設計，是坪井正五郎嘗試再現其所堅持的日本民族混合論；那麼，當時已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琉球，又是如何看待該項展示？

就琉球的脈絡來說，琉球王國原本擁有自己的國家體制，不過，在身處日本與中國兩大國的夾縫中，琉球王國採取向兩方都朝貢的方式維繫生存。1879年日本廢藩置縣占有琉球之後，曾面臨幾次反抗的行動。依時序而論，首先是以琉球舊士族為社會基礎的「公會事件」，在日本透過廢藩置縣占有琉球之後，多達七萬多名的舊士族曾連名簽署希望讓琉球成為特別的自治區；不過，在日本戰勝滿清帝國成為亞洲第一大國之後，這個希望旋即破滅（小熊英二，1998: 282）。其次，則是著名的以悲劇收場的謝花昇自由民權運動。謝花昇是1865年出生於沖繩，作為貧困農民之子的他透過地方獎學金得以赴東京求學（太田朝敷與謝花昇同為第一屆縣費留學生），並成為沖繩第一個東京帝大畢業的學生；畢業之後，學習農業的謝花昇返鄉從事農業相關的工作，並深獲當地社會的眾望（又吉盛清，1997: 104；小熊英二，1998: 247；沖繩を知る事典編輯委員會，2000: 18）。不過，返鄉之後的謝花昇對當時的知事以及舊勢力任意開

放土地開墾許可的作法深感不滿，當時，日本本土已有眾議員選舉；謝花昇親赴東京陳情，希望沖繩得以進行議員選舉；不過，一方面在沖繩地方輿論的強烈攻擊，一方面在日本政府並未首肯（儘管有同情者）之下，謝花昇突然在神戶車站精神病發，之後回鄉靜養，卻也在貧困與疾病中去世（小熊英二，1998: 248；沖繩を知る事典編輯委員會，2000: 19）。

就1903年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展示琉球人對琉球人的衝擊而論，可以《琉球新報》的主筆太田朝敷為例。太田朝敷是琉球當地的舊藩士族出身，也曾參與公會事件，1882年到東京求學之後回鄉參與《琉球新報》的創刊事宜並成為該報重要的主筆（金城勇，2005: 54）。在琉球王國被併吞後數年前往東京求學的太田朝敷，求學期間便對西洋文明有著深刻的感受；而其求學期間，也正是福澤諭吉作品獨領風騷的時代，太田朝敷對福澤諭吉的作品也多所涉獵，日後太田朝敷於《琉球新報》所發表的文章當中，也可以看到受到福澤諭吉影響的痕跡，尤其是關於文明的討論（伊佐真一，1993: 501~502）。如前文所述，一八八〇年代社會進化論在日本盛極一時的年代，包括福澤諭吉也因為日本國際政治因素的考量產生了思想的轉向。值得注意的是，太田朝敷的思想當中，也帶有社會進化論的色彩。

回到沖繩的太田朝敷，對沖繩的許多舊習例如鋪張的儀典、舊士族與平民之間的階級區隔、傳統女性地位低落等感到不滿（小熊英二，1998: 282~283）。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伴隨世界文明歷史發展的潮流促進沖繩的進步以及打破地方陋習、發揮國民特質謀求國家的同化，成為太田朝敷社論撰寫的兩大支柱（伊佐真一，1993: 504）。步入二十世紀的日本政府開始積極對琉球進行同

化教育，而其側重點則在於文明的灌輸，例如沖繩舊慣的消除、衛生觀念的倡導、勞動倫理的注入等（小熊英二，1998: 41~42）。對於日本的文明化政策，太田朝敷甚表歡迎，在他1900年於沖繩高等女校開學式所發表的著名演說「噴嚏演說」當中就指出，「說到沖繩今天最為急迫的要務，從頭到尾就是要與其他府縣相同。極端一點來說，就連打噴嚏也要與其他府縣相同。」（伊佐真一，1993: 508）然而，對太田朝敷來說，日本化與文明化並非同一概念，雖然在《琉球新報》的文章當中，太田朝敷大倡同化，不過，他的企圖是希望透過同化所帶來的文明化，一方面消解他所認為的沖繩陋習，另一方面，更是希望透過同化能夠帶來沖繩人與其他日本人一樣平等的地位與權力（小熊英二，1998: 283）。

不過，學術人類館事件對他來說卻是個極大的打擊，在該事件之後，他在《琉球新報》發出強烈的感慨，在他的看法當中，沖繩的舊慣已逐漸改變，例如沖繩男女的服飾外貌已與日本本土相近；然而，日本本土人卻仍以特殊眼光對待沖繩，尤其日本本土將沖繩與愛奴等「劣等」人種並列（小熊英二，1998: 284）。歷經學術人類館的打擊，太田朝敷反而提出加速消解日本與沖繩差異的「沖繩縣民勢力發展主義」。學術人類館事件發生之後，他便在《琉球新報》發表文章指出：

我輩因為以沖繩人民的勢力發展為首要之務的緣故，遇到關於沖繩人勢力消長有關的事情，無論犧牲什麼都敢說。如果要追求沖繩勢力發展的話，就是要追求「沖繩縣民勢力發展主義」（比屋根照夫，1996: 498）。

所謂的「沖繩縣民勢力發展主義」，就是從例如片髮等舊習俗轉為散髮等新習俗、從四書五經的舊教育轉為新教育

（比屋根照夫，1996: 497）。除此之外，太田朝敷也向沖繩人喊話：「本縣民總是不關心體面。到了沖繩縣民不關心沖繩體面的心理去除之後，才是向全國發展沖繩力量的時機。」（比屋根照夫，1996: 500）

綜觀太田朝敷在學術人類館前後的思想轉變，儘管太田將文明化與日本化視為不同的概念，但是，學術人類館事件之後所發出的感嘆所突顯的是，他的思考模式也落入統治者所界定的同化等於文明、反同化等於野蠻的邏輯（小熊英二，1998: 285）。最終，在追求沖繩力量獲得殖民者尊重的過程當中，原本所極力追求的文明沖繩，逐漸成為一個被同化的沖繩。

附註

註1. 關於臺灣館的展示內容及其對臺灣觀光客的影響，詳見：呂紹理，〈展示臺灣：1903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臺灣史研究》，9(2): 103~144；該文並收錄於：呂紹理著，2005，《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113~151，臺北：遠流。

註2. 本文中所提及的岩倉使節團出訪之際，將留守政府交給大隈重信、板垣退之助與西鄉隆盛，並定下不得隨意變更制度與人事的《約定十二條》。不過，其間留守政府卻推動引起藩伐反對的兵制改革以及引發征韓問題；岩倉具視返回日本之後，重整權力中心，其結果為留守政府的崩潰漢歸國派重新掌握政權。詳見：升味准之輔著、董果良譯，1997，《日本政治史 第一冊》，頁：120~129，北京：商務印書館。

註3. 就福澤諭吉的思想脈絡來說，福澤諭吉認為要抵擋西方文明國家的力量，

應當結合鄰國中國與朝鮮，雖然中國與朝鮮遲鈍，無法抵擋西洋力量，不過，日本應當以武力保護、以文化誘導。福澤諭吉本人也支持朝鮮的改革派，不過，甲申事變之後，日本介入朝鮮的力量受挫；福澤諭吉也因而認為「與其等待鄰國開化共同興亞，不如脫離他們的隊伍」，「親近惡友的，不免要與其共享惡名。我們要在心中謝絕亞洲東方的惡友」。詳見：升味准之輔著、董果良譯，1997，《日本政治史 第一冊》，頁：186、192，北京：商務印書館。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 1997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
-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 2004 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李永熾 1998 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臺北：稻鄉。
- 亨里埃塔 利奇(Henrietta Lidchi)著、徐亮與陸興華譯 2003 他種文化展覽中的詩學和政治學。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編、徐亮與陸興華譯 表徵：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頁：168~207。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 2005 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東方。
- 南博著、邱淑文譯 2004 日本人論。臺北：立緒文化。

日本文獻

- 二宮一郎 2005 人類館發起人 西田正俊について。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

印された扉。頁：120~140。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

- 上野益三 1968 お雇い外国人 3 自然科学。東京：鹿島出版会。
- 小熊英二 1995 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 1998 「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 台湾 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 山路勝彦 2004 拓殖博覧会と「帝国版圖内の諸人種」。關西大学社会学部紀要，97: 25~40。
- 久米邦武編著、水澤周譯註 2005 現代語譯 特命全權大使 米歐回覽實記 第五卷。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株式会社。
- 丸山真男 2003 丸山真男集 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
- 広田昌希 1985 対外政策と脱亞意識。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歴史(7)近代 1。頁：301~345。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石川榮吉等 1987 文化人類学事典。東京：弘文堂。
- 石田雄 1998 「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観念としての「日本」(上)。思想，892: 47~75。
- 石田一良 1963 日本思想史概論。東京：吉川弘文館。
- 石川圭三 1990 日本キリスト教史。東京：吉川弘文館。
- 守屋典郎 1993 産業革命の進行。宮川寅雄編，新版日本生活文化史第八卷 生活のなかの国家。頁：20~38。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 吉見俊哉 1998 博覧会の政治学。東京：中央公論社。
- 田中彰 2003 明治維新と西洋文明：岩倉使節団は何を見たか。東京：岩波書店。
- 比屋根照夫 1996 同化論の成立と展

- 開：明治三十年代の論説を中心。比屋根照夫、伊佐真一編著，太田朝敷選集 下巻。頁：488~507。東京：第一書房。
- 竹○尚一郎 2001 表象の植民地帝国：近代フランスと人文諸科学。東京：世界思想社。
- 永積昭 1981 東南アジアの留学生と民族主義運動。東京：巖南堂書店。
- 呂順長 2005 大阪人類館における中国側の対応について。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98~119。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
- 伊佐真一 1993 沖縄近代史における太田朝敷：その軌跡と思想の特質。比屋根照夫、伊佐真一編著，太田朝敷選集 上巻。頁：496~535。東京：第一書房。
- 沖縄を知る事典編輯委員会編 2000 沖縄を知る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
- 金城勇 2005 学術人類館事件と沖縄：差別と同化の歴史。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27~69。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
- 佐佐木克 1992 日本の歴史(17) 日本近代の出発。東京：集英社。
- 長谷川由希 2005 アイヌ民族と植民地展示：1903~1913年の博覧会から。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23~26。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
- 松田京子 2005 人類館事件が投げかける現在的問題。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151~168。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
- 坪井正五郎 1903 人類学研究所としての我国。東京人類学会雑誌，99: 32~36。
- 1905 人類学的智識の要益深し(承前)。東京人類学会雑誌，232: 433~443。
- 尾崎秀樹 1993 余暇のたのしみ。宮川寅雄編 新版日本生活文化史第八巻 生活のなかの国家。頁：128~136。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 直木孝次郎 1973 日本の歴史(第一巻) 倭国の誕生。東京：小学館。
- 神山四郎 1981 福○諭吉選集第四巻 解説。富田正文編，福○諭吉選集第四巻。頁：323~362。東京：岩波書店。
- 南博與社会心理研究所 1990 續・昭和文化(1945~1989)。東京：勁草書房。
- 真栄平房昭 1999 人類館事件：近代日本の民族問題と沖縄。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日本人と多文化主義。東京：国際文化交流推進協会。
- 野村浩二 2005 人類館事件と同化への誘惑。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23~26。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
- 富田正文編著 1989 福○諭吉選集 第一巻。東京：岩波書店。

收稿日期：94年1月6日；接受日期：95年4月7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於法國巴黎從事自由寫作。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Exhibition: Example of “The House of Peoples” at the Fifth Industrial Exhibition in Japan

Cheng-Liang Lee*

Abstract

The fifth Industrial Exhibition was held in Osaka, Japan in 1903. As part of this exhibition, “The House of Peoples” was originally organized to include exhibitions on the peoples of China, Korea, Okinawa and Taiwan. However, following protests by China and Korea, the displays related to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removed. The displays concerni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kinawans remained, as these two areas were colonized by the Japanese at that time.

Although the “The House of Peoples” exhibition was controversial, it later became the exemplific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exhibitions. The design concept of “The House of Peoples” was based on an arche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ory put forth by Tsuboi Shogoro,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Japan. With the expansion of Japan’s territory, Tsuboi Shogoro’s theory concerning the blending of the Japanese nation not only entered political discussion, but also steadily became mainstream thought. The first Colonial Exposition held in Tokyo in 1912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emergence of this theory.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elucidate the imag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mong Japanese and how that image was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House of Peoples” exhibition.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he House of Peoples” on colonized Okinawa will b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that occurred following that exhibition.

Keywords: The fifth Industrial Exhibition, The House of Peoples, Tsuboi Shogoro, Japan, Okinawa

*Freelance writer; PhD in Scienc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